

大咖观察



本期主持人 汪修荣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总编辑

翻译家余泽民长篇新作《纸鱼缸》问世 特别的匈牙利,特别的余泽民

他是诺奖得主凯尔泰斯·伊姆莱口中的亲人,他翻译了马洛伊·山多尔的多部代表作。勤奋的匈牙利文学专家余泽民,连续数年全力翻译东欧文学的经典之作。其实他还是一位小说家,翻译之余一直在默默进行中文创作,《纸鱼缸》即是他的长篇小说力作。

对于余泽民而言,阅读、翻译、写作“三位一体”、密不可分。二十多年前只身去往匈牙利时,他对这个国家和这个国家的语言一无所知。生活中听的是匈牙利语,说英文、匈文配合手语,读英文小说,用中文写信和日记,正是在这种听说读写的分裂中,余泽民开始了翻译和写作生涯。

现代快报记者 陈曦

凯尔泰斯,命中的贵人与精神导师

读品周刊:你大量从事欧洲文学的翻译工作。凯尔泰斯·伊姆莱的作品是你最具影响力的译作,能谈谈翻译对你写作的影响吗?

余泽民:要知道,翻译小说和阅读小说区别很大,读小说时你只关心故事和感受,而翻译的时候你会注意到作者的布局和手法。我翻译了几篇之后就萌生出冲动:这个故事如果让我来讲,我会这么讲……于是,我开始了自己的讲述。翻译对我来说很重要,即使最高级的阅读,也是写作的训练,而我自己写的书,则是自己阅读与翻译的结晶。

读品周刊:3月31日凯尔泰斯去世,这对你意味着什么?

余泽民:孤独。我知道,以后我再翻译他的书时,我没人可以询问了。我在多个场合讲过,凯尔泰斯和我不仅仅是作者与译者的关系,是他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我是从翻译他的书开始走进一个个文学大家的精神世界,是他的文字让我相信并实实在在地体验到:精神生存也是真实的生存。我将他视为命中的贵人与精神导师。

读品周刊:凯尔泰斯无疑是个不那么“可读”的作家,他一生都在为了自己而写,从不考虑市场和流行的问题,你如何处理你小说里的可读性和思想性的关系问题?

余泽民:凯尔泰斯的书不是那么的“可读”,但是那么“可想”;他的书注定不会流行,但注定传世。

曾有好奇心的朋友给我提过“如何增强可读性”的建议,比如,建议我在以后的小说里增加中国角色,因为太多的外国人会让中国读者产生疏离感;比如,建议对外的文化、历史不必陷入太深,因为国内读者更喜欢《北京人在纽约》那类中国式故事……我的早期小说确实这样。但后来我朝着反方向发展,更乐于把一个中国角色放到相对封闭的当地环境中观察、分析,这样发生的故事肯定不是中国式的,肯定独特。在写《纸鱼缸》时我仍没“听劝”。

希望能保持文字的翻译感,这是我的特色

读品周刊:听说你阅读用英语、匈牙利语,写作用中文,这种在多种语言间切换的状态,会给你写作的语感带来什么影响?

余泽民:有朋友说过,我写的小说更像翻译小说,但对我来说没那么复杂,就是我自己的语言写作。因为在我出国的二十五年,有六七年几乎不说中文,有大约十五年没读过中文小说。我这么做是有自己的考虑:一是对国内许多题材不感兴趣;二是有意不受语言上的影响。换句话说,希望能保持我文字的翻译感,这是我的特色,另外也有助于自己在思维、表达和预感上的独立性。

读品周刊:你是怎么开始写作之路的?

余泽民:真正开始写作是出国后,只在塞格德的诊所里工作了半年,我就陷入了绝境。那段故事还是留着以后讲吧,总之,失恋、失业、失掉居留身份,几乎发生在一夜之间。之后是近十年的流浪,没有钱,没有工作,吃百家饭,穿百家衣,在当地人的帮助下生活。正是那段生活成了我后来的写作资本。有几篇小说就是在几页日记的基础上加工的。

不自由的人肯定不会有安全感

读品周刊:1991年你前往匈牙利,当时正值东欧剧变,匈牙利也处于动荡之中,是什么原因让你放弃在国内的安定生活,投入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完全陌生的环境之中?你是去寻找什么?

余泽民:对,东欧在动荡中,当时我26岁,也在人生的动荡期。总有人问我为什么出来,我回答得很简单:就是想光着脚,到世界上走走。我这个人表面老实巴交,心里是不羁的,不喜欢规矩方圆,梦想心灵探险。

跟其他出来淘金的同胞比,我的二十几年过得苦死了,简直就是苦菜花。但我自己很享受,因为我相信在匈牙利只有我这一棵苦

菜花,在欧洲估计也难找出第二棵。今天的《纸鱼缸》,就是我苦中的甜。问我寻找什么?我寻找我,我自己,一个与别人不同的家伙,不想当生活中的演员甲,不想当螺丝钉。

读品周刊:在匈牙利生活期间,你从事过多种工作,居留身份还一度“变黑”,为了生存有过一段非常艰难的时期,如果让你重新选择,你是否还有同样的勇气?

余泽民:人就是这样,当心中有爱,当生活中有一大堆爱你的人时,根本就不需要额外的勇气。爱会赋予你生存的能力和机遇。我的生活就是一部小说,许多奇怪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总是在最难最关键的时刻遇到贵人。我在大学的日记里就写过这么一句话,我相信我今后生活幸福与否建立在我爱的能力上。就这么简单,爱,以不变应万变。

读品周刊:小说中,东欧剧变之际,中国男孩司徒霁青逃离了自己的家庭和父辈,来到美丽却又充斥着不安和暴力的匈牙利。跃出鱼缸的金鱼以为外面是自由,等待着它的却是干涸、死亡。“纸鱼缸”是想表达什么?

余泽民:鱼,是我在国外生活久了后的一个真实意象。即便被命运安排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共生,穿梭游曳,追戏,贴近,但永远难有实质性的碰触。现代人的本质是孤独。

另外,我在这本书里最想表达的是个体与历史的关系,残酷历史在脆弱个体身上留下的特殊记忆。我想以我的方式写历史。这张纸,也可以理解为我们想要挣脱的那些囚禁我们的虚假历史。

读品周刊:这不由得让我想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宗教大法官》中的永恒提问:“你是要自由,还是要安全?”自由和安全,你把哪个看得更重?

余泽民:自由和安全都是相对的,但在相对的自由和相对的安全之间,我当然选择前者,因为自由是安全的前提。不自由的人肯定不会有安全感的。想起裴多菲的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匈牙利诗人也告诉我们:自由至上。



余泽民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6年3月 《纸鱼缸》

《纸鱼缸》是著名东欧文学翻译家、作家余泽民的长篇力作。小说通过一群异国青年与雾青的爱恨纠葛,把匈牙利的种族、家庭、历史融为一体,以个体的爱与哀愁映照出一个时代的悲欢。余泽民的海外生活阅历与文化经验构成了这本书深厚的背景,小说题旨深广,语言饱满,富有激情,几乎偏执的细节呈现使作品在一个有限的故事里得以无限地延伸,这是一部“活着”的小说。

——汪修荣

小编推送



《我们生活的时代》 入江昭 中信出版社 2016年3月

80多岁的历史学家,以邻家老爷爷一般的讲述方式娓娓道来一个历史学家怎样看待最近的过去。入江昭在国际上声誉卓著,是国际史学派的开山鼻祖。

《两访中国茶乡》(文库版) [英]罗伯特·福琼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6年3月

英国植物学家福琼于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来华,采集包括茶树在内的中国植物资源。本书对1843年和1848年的两次中国之行作了详细记录。

《唐人绝句启蒙》 李霁野 北京出版社 2016年3月

这本《唐人绝句启蒙》是翻译家、文学家李霁野给自己的孙辈讲解唐代诗歌的合集,他亲自精选了唐代一百三十多位诗人近四百首绝句,逐一讲解。

《我们香港这些年》 徐天成 中信出版社 2016年3月

自称“港怂”的北漂律师徐天成,看到廖信忠所著《我们台湾这些年》之后,深受启发,希望能以一位普通香港人的视角,来说说一个真实甚至未知的香港。

私人书单

复苏了 一个大陆的命运与梦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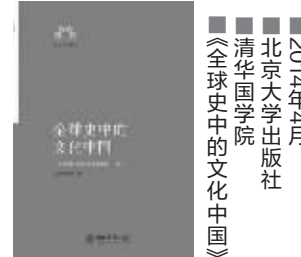


2015年4月 南海出版公司 「智利」聂鲁达 《我坦言我曾历尽沧桑》

荐书人 许金晶 金陵读书协会秘书长

《我坦言我曾历尽沧桑》是20世纪所有语种中最伟大的诗人巴勃罗·聂鲁达撰写的一部自传体回忆录,文笔奇崛。本次精心修订译本,无删节完整呈现。从流泪到亲吻,从孤独到人民,都活在这些历久弥香的文字中。诗人所有的生活和智慧,那些欢喜和悲伤,那些执着和信念,那个始终保持一颗童心的伟大的人,从智利的大森林中,从大海的涛声中,从辽远的星空下,从绿色的墨水中,第一次完整而真实地朝我们走来。作为几乎走遍当时世界各地的人,这本自传里有关于20世纪诸多历史变迁和各位重要人物轶事的细节描写,其文献价值和历史价值已经远远超越了一本诗人传记的范畴。

领导干部的文化讲座



2014年4月 清华大学出版社 《全球史中的文化中国》

荐书人 卞清波 江苏人民出版社编辑室主任

本书以清华大学国学院五位重量级专家刘东、刘迎胜、李伯重、姚大力、陈来向领导干部的文化讲座为底本,收录了五位导师关于全球史和全球化主题的一组讲稿。你可以说本书的体系没有那么严密,但是,你又不能不说本书立意高远、思虑幽深。刘东《全球文化与文化全球》对全球化的复杂侧面作了揭示,对其理论作了总结;刘迎胜《全球化视角下的古代中国》为我们生动呈现了古代中国与其他文明古国及周边世界的交流和互动;李伯重《早期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告诉我们,原来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并未“闭关锁国”,15—16世纪的中国和亚洲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挥过那么重要的作用……